

『十九世紀禮賢會在廣東地區的傳教工作』-陳緯樞(MCS2)

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禮賢差會在十九世紀在中國廣東地區的宣教工作。筆者首先簡述禮賢差會在德國的歷史、來華的過程，然後闡述禮賢差會在廣東地區的宣教方式及事工，最後，筆者將思想禮賢差會的宣教有否帶著殖民主義色彩以及禮賢差會建立的教會能否發展至自治、自養和自傳的模式。

(一) 萊茵差會

在 1799 年德國及北歐各國瀰漫著一片敬虔主義(Pietism)的氣氛。有一群熱心的平信徒在德國的艾伯菲(Elberfeld)市組織了德國宣教協會(German Mission Union)，目的是為宣教的事工禱告和奉獻。¹ 這班信徒於 1819 年在巴冕(Barmen)成立了一個差會(巴冕差會)，² 在 1828 年，這差會聯合了在萊茵河附近幾個城市的禱告宣教組織而成立了萊茵差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總部設在巴冕。早在 1925 年巴冕差會已成立了宣教學校，訓練宣教士往外國宣教。³ 萊茵差會在十九世紀曾差宣教士到西南非洲(今日的納米比亞(Namibia))、南洋婆羅洲、印尼蘇門答臘和中國南部傳道。⁴ 在此筆者略述一下在十九世紀德國內教會與差會(Missionary Society)的關係。在十九世紀初，在奉行更正教的德國地區的教會因著他們傳統保守的取向，沒有動力和彈性去做海外宣教的工作，⁵ 但當時的敬虔運動和大醒覺運動使很多平信徒心裡火熱，他們聚集在一起禱告，心中也有異像要傳福音給海外的未信者，於是他們紛紛組成差會，較有名的是巴色差會(Basel Mission Society)、巴陵差會(Berlin Mission Society)和以上所述的萊茵差會。就萊茵差會來說，它並不是教會，但它和當地—萊茵省(Rhineland)和西法利亞省(Westphalia)⁶—的眾教會有聯繫，並得到這些教會經濟上的支持，得以發展宣教的工作。⁷

(二) 萊茵差會來華

在論述萊茵差會來華宣教以前，不得不提一下自由宣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因為是郭士立把萊茵差會的人帶到中國。郭士立是信義宗第一位來華的宣教士，他在 1826 年被荷蘭差會派去印尼爪哇宣教，但他一心要向中國人宣教，因此他在 1829 年脫離荷蘭差會，作自由宣教士，在 1831 年他到了澳門。在 1842 年南京條約的草擬時期，郭士立充當了翻譯。⁸ 後來在 1843 年，郭士立到了香港任職「撫華度」(Chinese Secretary)，⁹ 負責香港華人事務。他日間在政府工作，只有在晚上和週末才能繼續他傳福音的事工。郭士立於 1844 年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這名字的意思是「欲漢人信道得福」，¹⁰ 「福漢會」並非教會，它只是一個訓練華人去傳福音的組織。「福漢會」曾派華人到廣東的鄉村傳教，甚至與當時在廣東的拜上帝會的人有接觸。

¹ Preston A. Laury, *A history of Lutheran Missions* (Reading: Pilger Publishing House, 1905), 81.

² 巴冕和艾伯菲是兩個接鄰的小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合併為較大的城市烏帕塔爾(Wuppertal)。

³ Laury, *A history of Lutheran Missions*, 82.

⁴ 徐炳堅：〈禮賢會的歷史和傳統〉(出版年月地不詳)，頁 6—7。

⁵ Th. Müller-Krüger, "Towards Church-Mission Integration in Germany,"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1964): 182—190, 184.

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兩省合併為北萊茵西法利亞省(Northrhine-Westphalia)。

⁷ Müller-Krüger, "Towards Church-Mission Integration in Germany," 184.

⁸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PCK, 1929), 253.

⁹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三)》(台北：宇宙光，1998)，頁 94。

¹⁰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三)》，頁 95。

¹¹ 後來福漢會會務繁重，郭士立便去信德國給他的好朋友及支持者巴特(Christian G. Barth)，叫他幫忙招募宣教士來華，¹² 巴特便在他出版的宣教月報(Calwer Missionsblatt)報導了很多有關中國在宣教上的需要和成果，也聯絡上萊茵差會和巴冕差會派遣宣教士來華，以幫助郭士立和「福漢會」的事工。¹³ 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下巴色差會派了韓山明(Theodor Hamberg)和黎力基(Rudolf Lechler)、萊茵差會派了葉納清(Ferdinand Genähr)和柯士德(Heinrich Koster)到中國來。在 1847 年 3 月這四人到了香港，郭士立親自歡迎他們，¹⁴ 並立刻安排他們學習中文，包括文字和聽講，郭士立給他們定的計劃是每天要閱讀三百個中文字並每人學習一種地方語言：¹⁵ 柯士德和葉納清學習廣東話，韓山明學客家話，黎力基學潮州話。¹⁶ 同年年底，郭士立便差派柯士德和葉納清在華人同工的陪同下進入內地宣教，葉納清在王元深、李清標的陪同下到了東莞、虎門，而柯士德在蔡福陪同下到了新會江門。可惜柯士德在同年年底染上痢疾，並死於香港。¹⁷ 在福漢會於 1851 年結束後萊茵差會繼續在廣東東莞、廣州、虎門一帶的工作。而萊茵差會傳入中國後，取名「禮賢會」，因「萊茵」在東莞話讀音為「禮賢」，也取其「禮賢下士」的意義。¹⁸ 在十九世紀時，東莞是禮賢會在廣東省最大和最早的教區。

(三) 禮賢會的宣教精神與策略

在宣教精神上，禮賢會也是受郭士立的影響。¹⁹ 郭士立在宣教上有三種觀念：一、把福音傳遍中國；二、發展神學教育以配合傳道；三、華人自傳運動。²⁰ 自葉納清在 1847 年進入東莞開始傳教後，德國萊茵差會便不斷派宣教士來華，截至 1900 年已有二十多位牧師到來，當中較有名的有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和花之安(Ernst Faber)，羅存德在華的服務年期是由 1847 至 1851 年，而花之安則由 1864 至 1881 年。宣教士在華人信徒的協助下，在東莞和東莞周圍設立教會，截至 1914 年為止，禮賢會在這些地區已設立了四十八座教堂，²¹ 而禮賢會宣教士的佈道範圍，已遠至廣東省東面的惠陽、博羅，西至廣西藤縣，北至英德、清遠，南至香港、中山。雖然禮賢會的宣教未能遍及中國，但在十九世紀時交通不便，並且治安不好的情況下，禮賢會已把福音帶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個廣東省。此外，禮賢會在內地開始了事工幾年後，便已派受過訓練的華人在沒有德國教士陪同下去傳道，例如在 1851 年第一位奉派往傳道的華人王元深已往福永傳道，²² 在 1855 年華人會友陳長興和莊滿和往廣西傳道，²³ 可見禮賢會是鼓勵華人自傳的。在神學教育工作上，禮賢會也在早期已開始發展。早在 1848 年，當葉納清進入東莞傳教後不久，他便在寶安西鄉創立禮賢會神道學校，²⁴ 給予中國信徒神學訓練，使他們可加入宣教的隊伍。此後神道學校曾作幾度搬遷，如在 1861 年遷到惠陽荷鏡、1864 年遷到福永，²⁵ 而中間亦有因人手不足而停辦，但始終禮賢會神道學校造就了不少教牧或宣教人員，較有名的有王煜初、王謙如(此兩

¹¹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台北：宇宙光，1993)，頁 81。

¹² Jessie G. Lutz and R. Ray Lutz, "Karl Gü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 The Chinese Union,"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d. Daniel B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2.

¹³ Lutz and Lutz, "Karl Gü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 The Chinese Union," 272.

¹⁴ Lutz and Lutz, "Karl Gü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 The Chinese Union," 273.

¹⁵ Lutz and Lutz, "Karl Gü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 The Chinese Union," 273.

¹⁶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頁 85。

¹⁷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頁 86。

¹⁸ 陳大川：〈活水源頭—禮賢會台北堂探源〉(出版年月地不詳)，頁 8。

¹⁹ 李志剛：〈香港母會歷史與傳統〉(出版年月地不詳)，頁 12。

²⁰ 李志剛：〈香港母會歷史與傳統〉，頁 12。

²¹ 陳翼堅：〈我對禮賢會來華傳道史的觀感〉，《禮賢月報》，第 5 卷第 3 期(1981 年 3 月)：頁 2。

²²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香港：禮賢會香港區會，1968)，頁 175。

²³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176。

²⁴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三)》，頁 123。

²⁵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85。

人乃王元深的兒子)、區寵三、王愛棠、羅彥彬等等。²⁶ 禮賢會神道學校在 1929 年正式停辦。

在本地化的事情上，禮賢會的宣教士也受郭士立的影響。郭士立提倡三樣本土化：教士本土化、宣講本土化和生活本土化。²⁷ 教士本土化的意思是主張西教士要訓練華人去傳教，宣講本土化是指教士要用中國的語言來傳道，這兩點基本上禮賢會的宣教士已做到，在上文已提及，然而，筆者要補充的是，宣講本土化這習慣到現在還有實行，今天在香港禮賢會的德國宣教士仍是說廣東話的。生活本土化的意思是叫西教士與華人一起生活，穿華服，束長辮，藉此使華人容易接納。葉納清來華時也是作華人的裝扮，這可參看在附頁上(附圖 1 和附圖 2)郭士立和葉納清的繪像。

在宣教精神和理念上初期禮賢會的宣教士雖然受郭士立的影響，但在傳教策略、傳教事工上的發展卻比郭士立更多樣化。在十九世紀時，禮賢會宣教的策略主要分三方面：宣教(傳福音)、教育和慈惠(主要在醫療方面)。在宣教方面，禮賢會在東莞、廣州一帶設立了很多教堂，以供信眾聚會，眾宣教士(德國人和華人)也到各鄉村作佈道，使人相信基督，然後受洗。當中亦有遇到抗拒和大大小小的困難，甚至有宣教者因此傷亡(在下文將略提一二)。在教育事業上，除上文所提及的神道學校外，禮賢會的宣教士建立了一所中學和很多小學(因為在各教堂都有附屬小學)。禮賢中學於 1900 年在耶山創立，全盛時期有學生七十餘人，但這中學在 1922 年停辦，這可能與中國政府改變了教育政策有關。²⁸ 此外，禮賢會宣教士也創立了聖經女校，以造就女傳道人，聖經女校一直由德國女傳教士主理，至 1937 年聖經女校停辦。²⁹ 在慈惠事工方面，禮賢會在十九世紀最大的貢獻就是開設了一所醫院和一所麻瘋病院。早在 1867 年，鐵威臨(Wilhelm Dietrich)牧師在東莞城開設了普濟醫院，但規模不大。直至 1902 年權約翰(Johannes Kühne)醫生把普濟醫院遷往脈瀝洲，並且擴充，使之成爲一所設備完善之醫院，在醫院中有佈道和培育的事工。在 1905 年權約翰開始了稍潭麻瘋病院的工作，在麻瘋病院內也建有一教堂，以供聚會。

禮賢會在內地的工作一直維持到 1951 年，在那年所有宣教士要撤離中國，而禮賢會的事工只有在香港繼續，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禮賢會才重新開始內地的工作。

(四) 禮賢會與政府和人民的關係

看過禮賢會在華宣教的主要歷史後，筆者將選擇性地闡述幾件個別的歷史事件，以反映禮賢會的宣教與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十九世紀中葉正是太平天國起義的時期，他們在廣東省很活躍，而他們的活動也很有基督教的色彩。在 1855 年禮賢會羅存德牧師派教友陳長興和莊滿和由廣州乘船到廣西傳道，他們在船中傳道時被人懷疑是太平天國的人，結果他們被捕、被押往廣州。羅存德因找不到廣州的德國領事幫助救二人，只好找英國領事，可惜當時廣東總督葉名琛不喜歡洋人，因此沒有應英國領事的要求而放人，令陳、莊二人押死獄中。³⁰ 由此可見在十九世紀中葉時外國人勢力在廣東地區還是不大。1870 年在東莞發生神仙紛事件，有人誣告教堂的人用毒粉毒殺村民，因此在東莞很多禮賢會堂被匪類藉詞破壞，教堂被焚，禮賢會的牧師如公孫惠(Adam Krolczyk)、能約翰(Johann Nacken)和花之安亦需走避，王元深和妻皆被匪類毆打，但性命得保。此事後來被地方政府平息，但因此事涉及外國人財物損失，地方政府有作賠償，禮賢會西教士的損失也得到賠償。³¹ 在此事可見當時在東莞地方治安不靖，宣教是件危險的事情，不過我們看見外國人的勢力也漸漸大了。在 1906 年連普安(Hermann Linden)牧師在增城遇劫，失款二百元，³²

²⁶ 參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85—87。

²⁷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三)》，頁 101。

²⁸ 參陳翼堅：〈我對禮賢會來華傳道史的觀感〉，頁 2。

²⁹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88。

³⁰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12。

³¹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34。

³²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頁 147。

德國領事爲此事向中國政府索償，結果政府外務部賠了二千元醫藥費。³³ 踏入二十世紀，特別經過八國聯軍後，外國人的勢力越來越大，雖然廣東地方不是德國的管治區，但當德國人人身受損時，他們還是得到中國政府賠償。在 1905 年稍潭痲瘋病院開幕前，當地居民歧視痲瘋病人，因此反對醫院的建立，後得到兩廣總督的調解，病院才得以順利開幕，³⁴ 由此可見教會的工作也被當地政府肯定。

(五) 禮賢會、三自、殖民主義

在本文的最後一部分，筆者嘗試從上文所述來檢討禮賢會在廣東的宣教有沒有殖民主義的色彩，以及禮賢會在自治、自養、自傳能做到甚麼程度。禮賢會最早期的宣教士是在 1847 年來到中國(香港)的，那時德國還未完全統一，因此德國還未有足夠的力量建立殖民地。此外，禮賢會到中國是藉郭士立作中介人的，而郭士立也是自由宣教者，不代表任何國家(雖然他後來爲英國政府在香港工作)。我們最多可以說，郭士立藉香港成爲了英國殖民地這機緣開展了傳教事工，也把禮賢會帶進中國。再者，在後來(八國聯軍時)，廣東省從來不是德國的勢力範圍，也沒有德軍進駐在其中，因此，禮賢會在廣東的宣教是沒有殖民主義色彩的。這也可歸咎於德國的萊茵差會是由敬虔運動影響下的民間團體所產生出來的，因此他們在傳統上受國家和政權的影響不會很大。我們最多可以推論因爲在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後，德國得到山東一帶地方的管治權，德國在中國北方這些勢力擴張可能令廣東的地方政府對禮賢會(一個德國差會)的態度有所改變，從上一段所述有關地方政府逐漸看重與禮賢會的關係我們可作如此的推想。我們也可說禮賢會在廣東的工作間接受惠於德國在中國北方的殖民主義。

回顧禮賢會的事工，在「三自」上她只能做到自傳，因爲德國宣教士訓練了不少華人作傳道的工作，有的更做了牧師，如王煜初、王謙如，但在自養和自治方面就完全談不上了。在筆者接觸到有限的資料中，³⁵ 從沒有提過在廣東建立的禮賢會實行過自養的，反之每有新的事工，例如建立痲瘋病院，德國母會一定要提供經濟援助，甚至德國宣教士要回德國籌錢。³⁶ 在十九世紀廣東的禮賢會負責管治的全是德國宣教士，華人同工只有輔助，一切治權都在德國人手中，但在筆者所接觸到的資料中，沒有提及德國宣教士和華人同工有衝突，反而是德國宣教士(如花之安)因與德國母會意見不合而離開禮賢會。³⁷ 可能在中國皈依基督進了禮賢會的華人大多是平民階層，有些信徒入了禮賢會工作後生活好了，也感激禮賢會，因而很順服。禮賢會真正能實行華人自治要等到 1934 年在香港才開始。³⁸ 總的來說，在禮賢會十九世紀在廣東的差會工作中我們看到很全面的宣教，這包括了佈道、教育和醫療事工，祝福了不少中國信徒。禮賢會在中國建立的教會雖然沒有自治、自養，但華人信徒與西教士的關係和諧。雖然禮賢會的宣教事工不算大規模，但總算在中國的廣東地區爲主發光發熱。

³³ 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頁 157。

³⁴ 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98。

³⁵ 從筆者與一位禮賢會香港區會幹事的談話中，筆者得知很多有關十九世紀在廣東的禮賢會的歷史資料原來在東莞教堂，但後來 1949 年解放後這些資料不幸被毀滅了，香港區會也沒有這些歷史資料，現在唯一可能有這些歷史資料的地方是德國萊茵差會的檔案室。

³⁶ 參羅彥彬：《禮賢會在華傳教史 1847—1947》，頁 97。

³⁷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373.

³⁸ 陳翼堅：〈我對禮賢會來華傳道史的觀感〉，頁 2。



附圖 1

圖片來源：李志剛：〈香港
母會歷史與傳統〉，頁 11。



附圖 2

圖片來源：陳大川：〈活水
源頭——禮賢會台北堂探
源〉，頁 8。